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穆旦评传

易彬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穆旦评传

易彬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策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旦评传 / 易彬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1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ISBN 978-7-305-10742-9

I. ①穆… II. ①易… III. ①穆旦(1918~1977)—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369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
书 名 穆旦评传
著 者 易 彬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36.5 字数 456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742-9
定 价 92.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入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历史悲剧。我们是一个

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道理,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性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

但是我想举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入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做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读,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性日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

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我们充分注意到了读者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自由王国”境界的。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炉。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文化书籍。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丛书编委会

2012年1月

目 录

001 / 引言	沉默的诗人
012 / 第一章	“破落户子弟”
020 / 第二章	南开校园诗人
049 / 第三章	清华校园内外
062 / 第四章	北平,长沙,昆明
082 / 第五章	昆明,蒙自,叙永
109 / 第六章	赞美:在“命运”和“历史”的慨叹中
128 / 第七章	“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162 / 第八章	大西南时期
188 / 第九章	《新报》时期
213 / 第十章	沪宁线上
250 / 第十一章	“愤怒”、“安憩”与“被点燃”的青春
270 / 第十二章	出走与归来
296 / 第十三章	最初的契约

320 / 第十四章	“外文系事件”风潮
349 / 第十五章	“穆旦”的短暂重现
373 / 第十六章	“穆旦”与“查良铮”
397 / 第十七章	“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
435 / 第十八章	“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
486 /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梦想冲动
511 / 第二十章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556 /	征引文献
572 /	后 记

| 引言 沉默的诗人 |

一、有意的沉默

穆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现今读者自然已不再陌生，他是一位诗人，以“穆旦”名世，实存诗歌约为 154 首，数量不算大，一册即可全部编定，包括《穆旦诗文集》所录 146 首^①，还包括收入《穆旦诗全集》^②但未录入《穆旦诗文集》的 2 首^③，以及陆续发掘的佚诗 6 首。^④ 实际跨度大致为 1934—1945 年，1947—1948 年，1951 年，1957 年，1975—1976 年，相

① 目前收录穆旦诗文最为齐全的《穆旦诗文集》（李方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实录穆旦诗歌 147 首（包括收入第 2 卷的散文诗《梦》），其中《法律像爱情》属误收，为奥登诗歌的翻译。

② 李方编选，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即 1948 年发表于《中国新诗》的《绅士与淑女》以及 1976 年的残诗《面包》。

④ 6 首佚诗包括《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祭》、《失去的乐声》、《X 光》、《记忆底都城》，以及晚年所作叙事长诗《父与女》。

当多的年份为空白。穆旦同时又是一位操持俄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的翻译家,基本上以本名“查良铮”名世,早年所译不多,多半为差不多同时期的英语诗歌与理论作品;1953年从美国回来之后,俄语作品的翻译一度占据了上风,主要是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普希金的诗歌,包括用俄语来转译英语世界的作品,但也有拜伦、雪莱、布莱克、济慈、费朗罗等英语诗人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受难期内,对于拜伦的翻译一度更为醒目,对于俄语诗人丘特切夫的翻译和对于“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则是新的现象。诗歌和译作之外,穆旦还存有少量的散文、书信和日记,日记是较少记载,散文较少看起来是因为是对此一文体的有意摒弃,书信原本是较多的,但失之于佚散或毁弃。这些写作的内在涵义后文自是将会一一剥索。

看待一位写作者,惯常的做法自然是从其身上那种与他人相异的因素入手,比如作品、创作手法、艺术理念,等等。这些实有的因素提供了一种原点,使得讨论不致散乱无形。

但是,有的时候,通过虚有的因素(品质)来看取一个写作者也是别有意味的。虚有,即没有的东西。或由于性格或能力的限制,或由于各种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每一位写作者都有他所没有的东西。与同时代的重要作家相比,穆旦所没有的那一种东西其实非常明显,那就是缺少自我的阐释。

前文所提及的诸种写作行为之中,从传记的角度看,属于自述类材料、传记功能更强的是日记和书信。从《穆旦诗文集》所披露的来看,日记自1959年1月1日始,所记断断续续,一半是思想总结式的记法,其中摘抄了不少领袖或社论的观点,一半纯粹是流水账式的记载,完全看不到内心(尽管也可以认为,记什么本身就是一种倾向)。书信呢,从相关信息来看,新中国成立前穆旦与友人的通信数量并不少,但现存书信

可能仅有一封,其他的基本上都已隐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再也无从发现。50年代以来的书信,大部分也已被销毁,所存留基本上是最后几年的书信。而且,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来信才得以保存,如巴金的来信,这使得在理解穆旦的时候缺少了一种更为丰富可感的交流语境。

即便是有了这些残存的日记和书信,关于穆旦生平的主要信息,读者多半还是不得不依凭穆旦家人和友人的追忆文章。但在穆旦的若干具有重要转折意味的阶段,比如,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的经历(特别是“野人山经历”),1943—1945年间的大西南生活时期,1946—1947年间的“《新报》时期”,1949—1952年间的留学经历,1954年发生的“外文系事件”、肃反事件,1959年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均缺乏深入的自我论述,多有晦暗不清之处。

何以如此呢?从表象看,这一局面与穆旦实际生活的年代有关:新中国成立前,穆旦大致属于那种为工作而四处奔波的小职员,缺乏必要的文化地位,自我阐释的机会自然是稀缺的;1953年初回国之后,自然也是没有自我阐释的语境,实际上,因为声名较小等原因,穆旦公开发言的机会寥寥可数。再往下,1977年2月,穆旦即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其时,穆旦59岁,“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新时期”的曙光正微微透现,但穆旦已无从领受。对于一位历经磨难的中国写作者而言,“新时期”意味着什么呢?

各人经历相异,意味自然也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多半相通,那就是在“新时期”以来相对开明的文化语境中,一大批写作者通过各种文字完成了一种自我建构——甚至是重构。比照那些顺利进入“新时期”的诗人,比穆旦年长的诗人,如艾青、冯至、卞之琳等,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如杜运燮、郑敏、王佐良、袁可嘉等,无一例外地写下了较多评论文字与自我阐释类文字,其中,也包括若干对于穆旦的追忆与阐释。

这自然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虑到20世纪中叶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对于作家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在这种建构或重构之中,既会有真诚的回忆或悔悟,也难免刻意的伪饰与辩解,这对于作家形象的传播,对于文学史写作正面与负面的作用自然都是可待进一步深究的。这里仅略举卞之琳与穆旦相对照的一例,来看看其中可能产生的效应。

卞之琳是一位低产而高效的诗人,他的诗歌不多,但备受称道。新时期之后,卞之琳即出版了《人与诗:忆旧说新》^①,后又写作了一系列追忆文章,刊载于《新文学史料》等刊物,既追忆自我历史,也品评历史人物。这些文字的总体数量也不算多,但一经问世,即成了卞之琳研究的重要参照;由于卞之琳本人的历史亲历者身份,这些文字也就成了重要的“新文学史料”。

所要说的“对照时刻”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其时,卞之琳正从英国归来。半个世纪之后,其行为、动机(包括受解放战争的感召,也包括焚毁创作历时八年之久的《山山水水》,等等)得到了自我追认^②;其自我历史的发展线索——个人成长史附和着国家历史的发展潮流——借此清晰地建构而出,学界也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相关讨论也显得清晰而从容。

而同一时刻的穆旦“出走”,因为在公开的文字层面,穆旦本人没有任何自我说明,学界多半置之不顾而不做任何解释(抑或无法给出一个有效的解释)。这对于作家个案的研究乃至文学史的写作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一部研究讨论具有“转折”意味的20世纪40—50年代的文学

①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卞之琳:《山山水水·卷头赘语》,《卞之琳文集》(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272页。按:实际上,由卞之琳本人生前编订的《卞之琳译文集》、《卞之琳文集》也显示他对于作品(自我形象)的珍视。

的著作里,作者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穆旦“非常积极”地选择回国,并将这种选择与沈从文、萧乾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选择留下来的举措相比照,认为他们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去”与“留”(归)问题上做出选择的“三种类型”,即“非常积极”地回来(穆旦)、“被动的因素更多一些”(沈从文)、“完全主动”(萧乾),体现了一种“民族认同感”,但对穆旦“出走”事件,对“出走”与“归来”之间的内在关联却未置一言。^① 似乎可以认为,正因为缺乏穆旦本人的解释,又缺乏相关的背景材料,以致在相关历史的认知中不得不以盲点状态出现。

二、历史的假设

再回到穆旦缺少自述的话题。似乎也可以说,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视域当中来看,过早的逝世使得穆旦失去了一个塑造自我历史的机会。事实已然,但好事的读者难免会有所假设:如果穆旦活了过来,他会不会也写下一些自我阐释类文字或追忆文字?从穆旦晚年写下的较多书信看,这一假设确实有相当的可能性。书信写作本身即意味着心境的敞开,有话要说。若顺着这样的思路往下,穆旦若活着进入“新时期”,多半也会像其他的历史亲历者一样,受一种回顾历史、重塑自我的语境的鼓舞而开口说话。

但这一切已被无情地中断。在那些书信之中,晚年穆旦的心境、写作与翻译行为、对于当时文艺的看法,等等,得到了较多说明,1975—1977年间的穆旦形象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其中,也有对于历史的整

①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4页。

体式判断,如对于白话诗和旧诗的态度;也不乏对于过往历史的自我阐释,如对于40年代的《还原作用》一诗的多次阐释。但所述基本上也仅限于此。总体上说来,所述均相当片断而零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如书信本身是相对随意性的文体,晚年穆旦的自述,其笔调基本上是即时性的,而仅在少数情况之下才是回忆性的,因此,既可以说,穆旦本人的晚年自述根本就无法勾连出他的早年形象,也可以说,穆旦本无意于自身形象的建构。如果可以这么认定的话,那么,前者是结果,而后者则是原因所在。

若作更细致的辩诘,又可发现穆旦晚年书信之中,较多地透现了他当时的心境和翻译活动,但他同时也在进行的诗歌写作却较少提及,即便提到,口气也不如谈及翻译时那么热烈或坦荡。这意味着,在更多的时候,穆旦有意将诗歌写作视为一种私性行为,而无意于泄露更多的诗歌写作的秘密。由此,固然这些书信有助于理解穆旦的晚年写作,穆旦的初意却并非以它们来阐释自己的写作。这样一来,大致上可以说,从40年代到70年代,穆旦是一以贯之的,对于自己的写作有意保持缄默,无意于通过诗歌之外的其他文字来完成自己。

三、“档案”与“自述”

当然,另一个事实也必须指出,那就是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查良铮档案,档案材料现已随本人所作《穆旦年谱》^①披露,其中有多份履历表格或思想总结类文字材料(有三篇字数较多),时间从1953年回国之初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这类不是记于同一时期的材料尽管在一

① 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些日期上有细微的差异,但完全可以说,它们打开了穆旦生平经历中的很多死结(特别是穆旦从军归来之后在大西南时期的生活状况、“外文系事件”等),1965年之前,穆旦各时期的生平线索均可以得到更为清晰而深入的呈现。

但是,这与前述“自述类文字较少”并非同一层面的事实。穆旦的档案是在留美回国之后建立起来的,也即,此类文字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这样的政治敏感时期,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文化信息,而穆旦本人又正在经历种种政治磨难,比如,1955年10月在写《历史思想自传》时,穆旦正被列为“肃反对象”,因此,这些材料中的所谓思想“认识”或“总结”显然都包含着某种被裹胁的政治意识而缺乏足够的可信度。可简要地举1956年4月22日所写的《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为例来看。这是现存穆旦所有总结式材料中最长的一份,用方格稿纸竖行书写,共25页,约12500字,分10个时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交代”。如下为开头部分:

这次肃反运动中,使自己得到教育,提高了认识,坚定了立场,在肃反中,自己并且交代过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过,由于在小组上,感到群众的压力,并且由于自己的错觉(认为要说“实质”和“意义”,做了很多推论和假定),作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不负责任的交代。这里,我要就自己过去的重点问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叙述,同时指出曾经作过的不负责任的交代。我想尽力作出客观的叙述,不加自己的批判,以便使组织对我的过去作出明断来。

且不说文字中为自己所作的诸种曲意辩护,说一说当时所遗留下来

的一个细节：在交代出国前的思想状况时，穆旦写下了这样的时局认识：“我原已准备迎接解放，因为当时我认识到，共产党来了之后，中国会很快富强起来，我个人应该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高兴，他们翻了身，个人所感到的不自由（文化上，思想上）算不了什么，可以牺牲。”这段文字旁有四个字的批语：“纯粹扯淡！”在我看来，它以一种粗鄙而又相当地道的语言涵括了那些深谙政治文化奥秘的审阅交代材料的人对于穆旦的“思想认识”的基本看法。因此，我在将其编入《穆旦年谱》的时候，尽量只选取其中的事件线索，而剔除那些枝枝蔓蔓的“思想认识”。而本书对档案材料亦有较多引述，所称“穆旦档案”，即南开大学档案馆所藏人事档案之中的查良铮卷以及其他相关卷宗，不另注明。

正因为对于政治环境的体知，我将其视为穆旦所承受的历史压力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显示了回国后的穆旦是如何深陷于政治环境当中。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自述材料”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如果说，一般性的自我陈述是通过描述、勾勒、解释，以确立某种形象，从而达到自我阐释的效果，那么，这些尘封在档案柜里的文字所透现的，则是一个在强大的历史压力、复杂的时代语境挤压之下的渺小的、惶恐的、向内收缩的个人形象。其中的复杂性后文会有专门的讨论。当然，读者也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展开一些其他的认识，比如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写作者如何自处，等等。

历史已无法更变，能够看到的只能是目前这样的情形。综合来看，所谓“沉默”，其实有着双重的含义：“个人”的有意强化、“时代”的无意阻隔共同造设了一个沉默内敛的诗人穆旦形象。

从传记的角度看，材料较少且明显存在局限的情形实在可说是一种遗憾。但是，这也使得穆旦研究获具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一个缺少自我阐释的穆旦为世人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他通过较少的写作、较少的自我